

源桃是處何

著東耀遠 • 稿論史習



幼獅月刊
藝術叢書
⑧A

何處書是桃源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章藏

桃源

——
習史論稿

遂耀東著

何處是桃源

東耀遠：者 譯

順康陳：人 行 發

冰一朱：編 主

司公業事化文獅幼：者 版 出

號一十五街中漢市北臺：址 地

元十六：價 定

戶帳號六三三三撥劃政郵

記登准核局聞新院政行經

號三四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

版三月二十年六十六國民華中

路是需要人走的

遯耀東

——「何處是桃源」代序

童年的日子在離亂裏度過，東西飄蕩的生活，很難留下什麼記錄。如今想找一幅兒時的照片，已不可得。所以也無法知道學步的樣子，我想那一定是笨拙的。就像現在回顧過去二十年來，在習史的道路上，蹣跚學步一樣，也是非常笨拙而幼稚。這個集子，就是我習史學步的歷程。

作爲一個歷史工作者的學徒，必須具有兩個起碼的條件，那就是耐心和毅力。長期伴著寂寥的孤燈，週旋在故紙堆裏，這種生活的確是非常無聊的。因此，必須有堅強的耐心和毅力支持才能熬過。可是我卻二者皆缺，既無耐心又缺乏毅力。所以，我作爲一個歷史的學徒，二十年來，只像一隻蝙蝠混跡在燕子羣裏，在黎明曙光和黃昏的晚霞裏飛翔。有時，也會把自己想像成一隻吻著海濤而遨遊的玄鳥，但最後還是跌落在陰暗的角落裏。

路是需要人走的

不過，畢竟我還是選擇了歷史作為自己的職業，而且發現這是一個很好隱藏的地方。尤其在這個沒有山林可供退隱、科學浪濤逐漸吞沒了我們生活空間的時代裏，歷史的確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遼闊寧靜的空間。但在這個寧靜的空間裏，生活了一段時日之後，現在仍然無法了解，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在追求歷史的真實以後，是否還應該繼續尋覓歷史的詩意和美感。因為那份激盪的詩意，正是迸發歷史工作者追求歷史真象的動力。但今天這份歷史的詩意韻律和美的形象，卻在科學的鞭笞下，變得冷漠和嚴肅了。因此，每當我在故紙堆裏鑽進鑽出後，總想伸出頭來看看藍天白雲，呼吸幾口清涼，捕捉利那即逝的思古幽情，偶然也有意外的收穫。收在這個集子中的「何處是桃源」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塑成的。也是在這個集子裏，有幾篇文章像分析昭君和藩的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、討論北魏幾塊宮女墓碑的「深宮怨」、以及談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知識份子的「城裏城外」，讀起來不像歷史，卻像散文的原因。不過，我卻並沒有在尋找歷史詩意和美感的途中，遺落了歷史的真。

因為追求歷史的真，肯定過去是一個客觀的存在，不僅是歷史工作者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神聖的使命。因此，一個歷史工作者，絕對不能容忍爲了某種政治的理由和目的，對歷史所作的任何竄改、歪曲和割裂。但事實上，這個我們唯恐其發生的悲劇，卻已經在我們現在的

這個時代發生了。因此，身為歷史工作者的我們，已無法再自鳴清高，更無法再做把頭埋在沙裏的駝鳥。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，面對這個殘酷的教訓，力挽這股向我們迎面撲來的逆流。否則，這股逆流將捲走兩千年來、我們祖先用血汗辛勤建築的歷史宮殿。然後，在縷縷迷霧縈繞下，我們再也無法分辨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這也是我過去十年來，對中共史學不斷批判的原因。集中的「中共歷史解釋的分析」、「中共上古史分期問題」、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中的史學與史學家」、「莫謂書生空議論」、「打不倒的孔家店」，就是因此而寫。

這個集子裏的十五篇文章，是我在非學院派的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一部份，因為我沒有剪貼和存稿的習慣，只找到這些。文章雖然很雜，卻都是寫的歷史，從上古到現代都有。這倒不是我能「通古今之變」，只是更證明我在習史的過程中，的確是缺少耐心和毅力，才落得今日的雜蕪，學無專精。

從習史開始，我就走上一條迂迴的路，而且在歧路上多次踟躕，甚至一度迷失而想放棄。但後來又幸運的歸了隊。這個集子便是我學步的歷程，爲了保存學步的笨拙，雖然其中某些觀點現在已經改變，卻沒有修正，裏面的錯也沒有更改。同時，我更得感謝「幼獅」的

路是需要人走的

何處是桃源

主編朱一冰兄，如果不是他一再的建議和催促，我是不會想到將這些散置的稿件結集的。

窗外大雨滂沱，一串路燈照在那條正在翻修的路面上，在深夜，那條路竟是那麼寂寞。那麼漫長，又那麼泥濘。但，既然是路，總需要人走的，尤其在這個一切都會起飛的時代，歷史的道路，更需要我們印上深深的腳跡！

四月十日夜三時

目次

路是需要人走的（代序）

前不見古人

~~~~~談中國歷史人物的塑型

深宮怨

~~~~~談談幾塊北魏宮女的墓碑

何處是桃源

陶淵明喝的酒

獨留青塚向黃昏

~~~~~昭君和藩的分析

司馬遷對史料的處理

目次

一  
一七  
三三  
五一  
五七  
七一



何處是桃源

二

## 城裡城外

- ~~~~~談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知識份子·····九三
- 對開國前一項歷史文獻的幾點試析·····一三一
- 關於三本張季直的傳記·····一四五
- 辛亥革命前後張謇的轉變·····一六九
- 莫謂書生空議論
- ~~~~~談中共的史學·····一九一
- 對中共「歷史解釋」的分析·····二一一
- 中共的上古史分期問題·····二二七
- 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風暴中的史學與史學家·····二五五
- 打不倒的「孔家店」
- ~~~~~論中共史學的再塑造·····二九五

## 前不見古人

### ——談中國歷史人物的塑型——

英國倫敦大學漢學教授杜希德 (D. C. Twitchett) 在他的一篇「中國傳記作品」(Chinese Biographic Wright, Historian of China and Japan, London 1961) 中，認為中國雖然是一個「傳記豐富的國家，但中國傳記的寫作，在頑強而牢不可破的傳統束縛下，經過兩千年的發展，時至今日仍停留在學步階段。」因此他說「中國列傳典型的例子，像編年史一樣，枯燥而無人的氣息，近代讀者欲尋傳主人的端倪，將發現極難形成不同的寫照。」(轉引杜維運先生「與西方史學家論中國史學」譯語)

作爲一個中國人，乍讀這段文字，似乎會有一種被輕蔑的憤怒。因爲我們一直以悠久的歷史，和延綿不絕的歷史記載而自豪；而且中國是世界傳記寫作創始的國家，司馬遷就是傳記寫作的鼻祖。我們的一部二十五史，即是以傳記體裁組合而成的。不過在我們讀過我們祖

先所留下那些珍貴遺產，然後再放下民族的優越感，冷靜地分析以後，也會承認杜希德並非無的放矢。是的，我們是一個傳記寫作豐富的國家，可是從司馬遷到現在兩千年以來，卻始終沒有產生一部像西方那樣氣勢磅礴的傳記著作，描繪出人在歷史狂濤中所發生的影響，以及個人對歷史的感受，這也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。

杜希德雖指出中國傳記寫作的缺點，卻沒有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，由於中國與西方傳記寫作，產生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環境之中，所以表現的方法當然不同，更無法相提並論。關於這個問題不僅杜希德不能了解，即使我們自己往往也會發生誤解。因為司馬遷的史記是由一百六七十個主要人物編織而成，那裏有帝王將相之輩，也有鷄鳴狗盜之徒，有「風蕭蕭兮」慷慨悲歌的義士，也有「力拔山兮」窮途末路的英雄。他所創造的傳記體，成爲後世歷史寫作遵循的形式。因而，便產生一種錯覺，認爲中國記傳體是以人爲主的。事實上，中國的記傳體和編年體一樣，同樣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，及演變的因果關係，所不同的，編年體是以年繫事，記傳體則以人繫事而已。

所謂「傳」，劉知幾說：「列事也」。趙翼更進一步解釋說：「古書凡記事立論，及解經者，皆謂之傳，非專記一人之事蹟也。」所以中國最早的「傳」，並非記載一個人的事

蹟，而是解釋經典的著作。所以尚書有大小夏侯，歐陽的傳，詩經有齊、魯、韓三家傳，春秋有公羊、穀梁、左氏、鄒夾氏幾家的傳。這些傳，也就是章實齋所謂的「依經起義」，「附經而行」的書。中國自古經史不分，章實齋又說：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。」所謂「六經」，「皆先王之政典也。」也就是說「六經」是過去經國的記錄。這些過去政治的紀錄，經過儒家加以整理與理想化後，歸納成一些原理原則。這些原理原則，轉過來變成後世政治最高指導的準則，社會所遵循的行爲模式及道德規範。而「傳」就是列舉事實來說明與解釋經典「微言大義」的作品。

同樣地，司馬遷以孔子的春秋爲藍圖，創造中國史學新的形式。他的記傳體將史料歸納成三類，分別以本紀、世家、列傳的形式表現。然後再將這些史料類比排列，分類解釋。從表面上看各傳獨立，互不相關，但事實上各篇間卻有著無形的邏輯關聯性。本紀是許多史料歸納的總結，然後再演繹成世家列傳。所以本紀祇記事的大端，僅敘某事發生在某時，至於事件演變的本末與影響，卻更詳盡地記載在世家或列傳裏。他寫本紀，是爲了追尋「王跡所興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。」他寫世家，是爲了說明「輔扶股肱之臣配焉，以奉主上。」他寫列傳，是爲了敘述那些「扶義倣黨，不令己失時，立功名於天下」的人們。由此可以了解

本紀所敘述的是歷史的主流，世家與列傳是解釋主流的發展與演變，所以世家與列傳對於本紀，正像左傳與春秋的關係一樣，將經典所含的意義，作更清晰的闡釋。除了本紀、世家、列傳之外，史記還有書、表，在此不作詳論。司馬遷融合中國古史寫作的形式，鑄造成中國史學新的版型，這個新的版型，一直支配了中國兩千年史學寫作的形式。

對於這種寫作形式，有人認為過於煩瑣，目前在美國執教的鄧嗣禹先生就認為中國的傳記體，把歷史分割成不清的碎片，因此讀中國正史，如吃西餐，本紀如牛排、列傳如素菜，讀者需自加選擇，自己調味。不過如果認清中國的傳記體以敘事為主，這樣的問題就不會發生了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可以從史記的類傳與合傳加以分析。所謂類傳，即是將事蹟相類的人物組合成一傳，像儒林、循吏、酷吏、刺客、游俠、滑稽、日者、貨殖等都是類傳。至於合傳，兩人或兩人以上，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，但事蹟、學術、境遇相似而合成一傳，如老子韓非，屈原賈誼，孫子吳起等傳屬於這一類。司馬遷寫這一類的傳記，是爲了說明某個歷史事件演變與發展的過程。像魯仲連與鄒陽合傳，魯仲連是戰國齊人，一介匹夫，游說諸侯義不帝秦；而鄒陽是西漢時代人，曾游說梁孝王不成而下獄，後來在獄中上書梁孝王得釋，這

兩個人不僅所處的時代不同，而且事蹟也不相類，不過他們都是游說之士，一個處於游說橫行的時代，一個處在游說沒落的時代，司馬遷「觀始察終」便選擇這兩個人物，敘述游說之士興廢始末。

趙翼認為史記「次第皆無意義，隨得隨編也。」像史記卷四十九李廣傳，五〇匈奴傳，五一衛青霍去病傳，五二公孫弘傳，對於這樣的編排方法，他批評：「朝臣與外夷相次」，顯得非常不倫不類。不過這一連串的傳記，目的在說明西漢對匈奴關係的轉變。因為西漢自白登之圍後，一直和匈奴維持著羈縻的和親關係，這種使賈誼痛哭的屈恥關係，直到漢武帝時代才重新調整。雖然李廣進攻匈奴沒有獲得成功，但他卻是漢朝對匈奴的關係，由和親轉變為進攻的關鍵人物，這是李將軍傳列在匈奴傳之前的原因。至於排在匈奴傳之後的衛青霍去病傳，因為他們是征匈奴的英雄人物，但如果沒有公孫弘對內經濟改革的成功，那麼這兩位馳騁在草原上的英雄，將不會出現在我們歷史的舞臺上。再說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「鳳求凰」，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風流韻事，但他所以能進入歷史，卻由於他出使西南夷，這是司馬相如傳編在西南夷傳之後的原因，所以不僅在史料的解釋方面，即在目錄的編排方面，司馬遷也同樣注意事與事之間的關聯性。

至於中國傳記記事的標準，則根據儒家的經典，司馬遷寫史記「欲上肇春秋」，因此不論在材料的選擇與材料的鑑別和考訂，完全依據這個標準。在材料的選擇方面，必須「不離古文者近是」，所謂「古文」就是儒家的經典。至於材料的鑑別與考訂，由於當時「載籍極博」而眾說紛紛，所以「必考信六藝」，也就是辨別材料的真偽，而以儒家的六藝為準則。另一方面，對於材料的解釋，同樣也以儒家思想為基礎。史記的本紀以五帝紀，世家以吳世家，列傳以伯夷叔齊列傳為首，主要的目的在闡明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——「禮讓」，至於列傳的首三篇伯夷叔齊、管晏、老子韓非等三傳，分別表揚儒家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的精神。因此司馬遷利用歷史事實，解釋儒家的經典，他所創造的傳記體，更接近劉知幾所謂的「傳，列事也。」

雖然，司馬遷根據儒家的經典，解釋歷史的事實，而且他本人又曾從董仲舒習過公羊，但他所處的時代，正是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的時代，儒家思想雖然憑藉政治力量，超越其他思想脫穎而出，卻是還沒有獲得絕對的領導地位，其他各家思想，在當時仍然保持原有的潛在影響。在他自序裏論「六家要旨」，雖然是闡述他父親司馬談的思想，同時也感染許多時代思潮的痕跡。

所以後來班固批評他，「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，序游俠而退處士，述貨殖則崇勢力羞賤貧。」也是說在漢書的作者班固眼中看來，雖然司馬遷尊重儒家思想，將孔子入世家，而且尊爲「至聖」，但他的儒家思想仍然不夠純正。這完全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。班固生長東漢儒家思想鼎盛的時代，而且又是經學世家，所以他的漢書不僅在寫作的形式上，同時在思想上，充份地表現這是一部儒家思想典型的作品。班固在自序中說：「唐虞三代，詩書所及，世有典籍，雖堯舜之盛，必有典謨之篇，然後揚名於後世漢紹堯運以建帝業……：史臣乃追述功德，編於百王之末，廁於秦項之列，太初以後，闕而不錄，故探纂前記，以爲漢書。」他在思想方面，由上古三代延續而來，也就是儒家思想一脈相傳的。漢書所以爲「書」，是想仿效「典謨之篇」的尙書。在寫作的方法上，他在自序裏又說：「綜其行事，旁貫五經，上下洽通，爲春秋考紀，表，志，傳凡百篇。」他將「本紀」直接稱爲「春秋考紀」，已經說明了他寫本紀和司馬遷一樣是仿孔子的春秋。因此，不論在思想與寫作的態度上，都充滿儒家思想色彩。漢書雖然是寫自「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，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」西漢一代的歷史，而後世稱漢書是中國斷代史的創始者。可是他的「古今人表」與「志」卻超越了漢代的範圍，後來受到劉知幾激烈的批評；他說：「表志所錄，乃盡犧年，舉一反



三，豈以若是，膠柱調瑟，不亦謬歟！」劉知幾的這種批評，多少有些武斷，因為漢書雖然寫西漢一代之史，但卻不能忽略班固的「旁貫五經，上下洽通」的目的，漢書是表揚西漢一代，在政治與社會各方面實踐儒家思想的著作。它的「表」「志」雖然超越前代，可是卻肯定儒家思想的價值，班固就利用這些價值判斷，作為衡量西漢政治與社會的標準。因此漢書比史記更能表現儒家的思想。這也是魏晉南北朝儒家思想中衰的時代中，一些衛道的知識份子，欣賞漢書遠超史記的原因。

中國的傳記體，在司馬遷創造出固定的形式後不久，班固更注入儒家思想，於是以後的傳記體，就成為政治與社會實踐儒家政治理想、道德規範的紀錄。這些紀錄分別由兩類人物表現出來：一類是合於儒家道德標準的明君、賢臣、孝子、義士、節婦；另一類是儒家行為規範的叛逆者，他們是昏君、亂臣賊子。不論這兩類人物的那一類出現在中國的史書上，都充滿教育的意味。讀中國史書，就成為讀夫子之教，聖人之道的另一個形式，了無詩意與美感，更無趣味可言。中國的史學家也在這種負荷下，載筆沉重，創造不出有血有肉、有感情有欲望的歷史人物來。這種現象正是杜希德所批評的。不過這種現象並不是兩千年來發展的結果，而是中國傳記寫作的形式在開始的時候，就不是為了塑造與描繪歷史人物，後來這